

丢失的巨人

〔美〕杰里·霍夫 著
徐葵 邹用九 裘因 译
徐葵 校

新 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丢失的巨人 / （美）霍夫著；徐葵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
2003.1

ISBN 7-5011-6028-7

．丢... ．霍... 徐... ．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俄罗斯
斯 ．F151.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9725号

京权图字：01-2002-5394号

The Logic of Economic Reform in Russia

by Jerry F. Hough

Copyright ■ 2001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Copyright ■ 2003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简体字版权属新华出版社

丢失的巨人

〔美〕杰里·霍夫 著

徐葵 等译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编：100043）

新华出版社网址：<http://xhcbs.126.com>

中国新闻书店：（010）63072012

新华书店经销

新华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新华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850毫米×1168毫米 32开本 11.125印张 260千字

2003年1月第一版 2003年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6028-7/D·954 定价：22.00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010-65895562 65897685）

前言

在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对俄罗斯的经济改革曾抱有的很高期望，都变成了深切的失望。1998年在卢布崩溃后，人们提出了俄罗斯改革失败的许多原因，对许多不同的人进行了指责。西方的一些人自然强烈地倾向于责备俄罗斯原有的条件或俄罗斯官员们的腐败，或者对两者都进行指责。

杰里·霍夫提醒我们，大家在1991年就已清楚地知道那些原有的条件，经济理论把腐败看做是经济角色对特定的刺激结构的合理的反应。他接受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道格拉斯·诺思*的论点：

* 诺思，道格拉斯·C (Norh, Douglass C. 1920—) 美国经济学家，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分别于1942年和1952年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学士和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至1949年在伯克利任教，1950年起任华盛顿大学教授，1961年起任华盛顿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现为华盛顿大学经济系教授。曾在1960年至1966年间任《经济史杂志》副主编，1972年任经济史学会会长，1975年任美国西部经济学协会会长，1973年任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历史研究中心客座主任。1993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诺思在经济学中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用古典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一般方法来研究经济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上，他将其理论称之为“制度理论”。诺思将其理论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之上：1、个人是为了他们自身利益而非集体利益而行动的；2、确立和保证规则得到遵守是要花费成本的；3、意识形态对人类最大化行为具有修正作用。他具体分析了诸如“西方世界的崛起”和“制度变迁与经济增长之关系”等重大经济史问题，并得出了下列基本结论：是以产权为核心的制度安排及其变革最终决定了西方世界的兴起，因为确定明确的排他性所有权能够为个人提供动力，从而使私人收益接近或等于社会收益率。考虑到国家是规定和实施产权的单位，故他重视研究国家在整个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由此，诺思成为美国影响日渐增大的“新制度经济学”重要代表之一。主要著作有：《制度变革和美国经济增长》，1971年；《西方世界的兴起》，1973年；《经济史的结构和变迁》，1981年；《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成效》，1990年。——译注

市场不是自我形成的机制，而是人们创造的一套机构和刺激。俄罗斯在1991年面临的挑战是要建立一套考虑到原有的条件和促进经济进步的机构和刺激。

霍夫试图在1992年至2000年间进行的8年研究的基础上，透过表面去详细描绘俄罗斯的经济制度是如何运作的。他作为一个政治学家分析了那个制度是如何从那个时期的俄罗斯政治中产生出来的。

他的基本任务不是去对人们提出的指责进行评价，而是去揭示俄罗斯各种经济角色的基本合理性。正如人们所期望的，他们确实对他们被赋予的刺激作出了反应，但是这些刺激不是抽象的新古典经济模式的刺激。与现实相矛盾的是，这些刺激却给予了人们乐观的暗示。为了引导各经济角色更有生产率地去行动，这种刺激制度是可以改变，也是需要改变的。

霍夫对研究腐败现象特别感兴趣。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在欧洲、美国和太平洋地区一些国家中，腐败现象在这些地区的最高经济增长时期相应地都是广为流行的。所以，以为可以彻底消除腐败，这是空想。也不能把消除腐败作为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努力使不可避免的腐败有助于经济增长，而不是破坏经济增长。

霍夫论证说，这里的秘密是在于，要懂得在早期的投资过程中由于严重缺乏信任而产生的各种问题，和政府在克服这些问题中应起的作用。他争辩说，大量政府、经济和军队官员在国内投资项目上的合作，不仅会提供安全投资的基础，而且会提供发展产权的刺激以及对政府的宪法制约。这一点不仅对俄罗斯，而且对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过程都有意义。

为撰写本书而进行的研究于1992年开始。从1993年到1997年在俄罗斯进行的4次大的独立调查是本书两章中所作的关键分析的基础。作者感到无法对他在这一过程中所得到的全部帮助和

他所欠下的知识债务都一一表示感谢。他在书中只好仅仅提到少数几个最突出的人，但他对不计其数的其他人同样表示深沉的谢意。

那些愿意匿名地对这种制度进行讨论的俄罗斯人，特别是在雅罗斯拉夫，提供了极其有价值的帮助。戴维·约翰逊给俄罗斯的和研究俄罗斯的专家提供了大量的服务，他通过因特网每天发布两三次《戴维·约翰逊通讯》。这一《通讯》不仅有很多来自俄罗斯的信息，而且成了一个论坛，这个论坛使霍夫能与许多私下同他交流的参加者进行讨论。

少数特殊的人在这个项目的各个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佛罗里达国际大学的拉尔夫·克莱姆、明尼苏达大学的伊夫林·戴维海泽、斯坦福大学的戴维·莱廷是一些调查项目的协作者。莱廷、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乔治·布雷斯劳和杜克大学的米歇尔·芒杰在后期从学术角度对手稿提出了主要的批评意见。琼·马歇尔·克劳福德阅读了不同阶段的手稿并提出了许多建议。

但还有在这些年中与作者紧密地在一起工作的5位朋友，作者把这本书献给了他们。如果没有这些朋友和同事，这本书是不可能写出来的。俄罗斯科学院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副所长约瑟夫·狄斯金在帮助阐明俄罗斯经济改革和在叶利钦与公民联盟阵营内部进行的辩论的一些细节方面起了关键的作用。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谢尔盖·图曼诺夫、俄罗斯科学院种族和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米哈伊尔·古勃格罗是在俄罗斯进行的调查的主要协作者，他们同地方上的学者一起进行了这些调查。塔季亚娜·古勃格罗在组织这些调查和编写资料的条目方面，表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效率和耐心。

最后要提到的，但远不是不重要，现任美国国际教育理事会研究管理者的苏珊·雷曼，她是在进行各次调查时最密切的协作者。她参与了申请各种资助的所有工作（确实，在某些场合

下她起了中心作用），保证在问卷中提出正确的问题，保证这些调查得以实现，资料得到整理，然后捉摸出这些材料的意义之所在。

最后，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在本书的出版方面提供了很大的支持，特别是戴比·斯泰尔斯，他对手稿做了卓越的编辑工作；英格·洛克伍德，他进行了校对并编了索引。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计划部的苏珊·杰克逊和她的接替者托德·德雷尔能干地做了核对工作。

本书中表达的观点完全是作者的观点，不应视为上面提到的任何个人或机构，或布鲁金斯学会的董事会、官员或工作人员，或资金提供者的观点。

布鲁金斯学会主席

米歇尔·阿马科斯特

2001年2月

序 言

本书提出的部分论点是以4次不同的调查中的数据为依据的。这些调查是：（1）1993年11月和12月进行的1993年俄罗斯议会选举调查；（2）1995年11月和12月进行的1995年俄罗斯议会选举调查；（3）1996年5月和6月进行的1996年俄罗斯总统选举调查；（4）1997年春对俄罗斯青年和年轻成人进行的两次同时进行与重叠进行的调查，一次是对17—18岁和23—24岁的青年和年轻成人的全国抽样调查，另一次是对前自治共和国首都的中学高年级学生的抽样调查。

参加1993年调查的主要调查人是杰里·霍夫、哈佛大学的蒂莫西·科尔顿、美国国际教育理事会的苏珊·古德利奇·雷曼。经费是由纽约的卡内基公司、麦克阿瑟基金会、布鲁金斯学会和国家科学基金SBR-94-02548和SBR-94-12051号资助提供的。

调查由两组学者在52个州和边疆区（只差3个以外的全部州和边疆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个城市和全部16个前自治共和国中进行。州里的学者们是在莫斯科大学社会学研究中心主任谢尔盖·图曼诺夫、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和人类学研究所副所长米哈伊尔·古勃格罗的督导下进行工作的。数据的编目和整理工作是在塔季亚娜·古勃格罗的督导下进行的，并由她作了两次核对。她是一位数学博士，几十年来在她丈夫进行的社会学调查研究中曾做过同样的工作。

地方上的学者都是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他们中大多数人有在他们的地区从事调查研究的多年经验，并都在当地的大学 and 研究所中兼做学者。许多人有他们自己的调查研究中心，其工作人员多至15人，少至5人不等。这个网络的成员们获得了一整套他们自己可使用和加以发表的数据。他们希望这些调查有助于推动俄罗斯社会科学的发展。调查是由俄罗斯和美国学者共同设计的。这些美国人都懂俄语，他们到俄罗斯，在那里商谈了拟定好的调查问题的措词。1997年对中学学生进行的那次调查所采用的方法是，在地方上的社会学家的监督下由学生们在教室里填写书面问卷。除此之外，所有调查都是由地方调查组成员在被调查者家中通过个别谈话的方式进行的。

1993年进行的全国性核心调查是以在俄罗斯国内约170个地方对任意抽样的3848名应答者进行采访而得的分类材料为基础的。议会选举后几天，又对应答者进行了一次选举后的回访调查，向他们提了一些新的问题。选举后的调查是由蒂莫西·科尔顿编写和主持的。

从计算机上的一个地区名单中任意选取了一些州和共和国中的区，以便到那里进行采访。在每个州和民族共和国，视每个行政区人口的多寡，进行40、80或120场采访。惟一的例外是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在这两个城市采访的场数更多，以反映它们更大的人口比例。在每个州里，调查是在州的首府及其邻近的几个城市和乡村中进行的。应答的人选是从区的选民名单中任意抽取的。

在美国，应答者的全套抽样一般都是在全国调查开始时选定的，如果找不到抽样对象或抽样对象拒绝回答问题，则不另找人替代。因此，学者们把这样的数据称为回应数据，调查所得的结果所依据的抽样，比调查开始时选定的抽样要少。按照俄罗斯的传统做法，如果抽样对象拒绝回答问题或在几次尝试以后仍无法

对之进行采访，则采访者可按一套规则另选替代者。的确，苏联学者过去常常采用一种定额制度，根据这一制度，地方上的采访者可在不同类型的人中挑选特定数量的应答者。采访者往往简单地挑选符合人口统计学要求的朋友和熟人。这种做法导致了在俄罗斯进行的许多民意调查中出现众所周知的随意性偏向。

当大多数美国人在俄罗斯进行学术调查时，他们采用美国的方法，他们的报告所依据的是标准的美国数据。我们认为，坚持美国的方法会增加虚假的可能性，因为莫斯科的公司和进行实地调查的采访者不相信西方人对很高的拒答率会表示满意。我们担心，他们向西方人报告的应答率和采用的挑选方法，也许和他们的实际做法是并不一致的。他们甚至可能使用未得到确认的、以他们所支持的候选人为基础的定额。

从理论上讲，由于拒答而遭扭曲的抽样和因找替代人而遭扭曲的抽样，只要替代是按严格的规则进行的，就不应有太大的差别。我们认为，如果告知领导调查的俄罗斯人可不严格采用定额方法，而允许他们采用替代方法，只要他们认为这样在作出任意抽样时能更好地把握被采访者的话，那么调查的结果会更加可靠。我们也以为，如果允许甚至鼓励俄罗斯人公布他们的数据，他们在俄罗斯的声誉将受到他们的调查工作的质量的影响，这会刺激他们诚实地和高质量地去完成他们的工作。

不管采用哪种抽样方法，学者们通常把所得的数据与人口调查的数据相对比，以便对这些数据进行衡量。这次调查中所得的全部数据都由苏珊·古德利奇·雷曼按年龄、教育水平、性别和城市／农村居民进行衡量。在衡量中使用的数据取自1994年2月国家统计局委员会收集的按5%的人口比例举行的1994年微观人口调查。调查所得数据是同时按4个参数作调整的，这4个参数是：年龄（18—19、20—24、25—29、30—34、35—39、40—44、45—49、50—4、55—59、60—64、65—69、70岁以上），教育水

平（未受教育、初级教育、不完全中等教育 = 1；中等、职业中等、不完全高等 = 2；高等和更高水平 = 3），性别（男，女）和城市 / 农村（乡村 = 农村，所有其他 = 城市）。

除了1993年的全国抽样外，同时在31个州中的每一个州、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个市和16个前自治共和国中（包括车臣，那里没有参加选举），用同样的问卷，进行了对1000名应答者的分别的地区调查。在每个州和共和国中的抽样按城市的大小加以分类，以取得不同类型的城市的有代表性的样本。在城市和农村中，应答者是从选民名单中任意挑选的。地区的学者被要求在3个星期的选举运动中的每一个星期采访1/3的应答者，而且在每个星期中都要保持大致相等的不同类型的居民点的混合状态。这就是要保证在选举运动中每天都有3000名左右有代表性的应答者，这样就可逐日的基础上去观察变动中的态度和拥护程度。

问卷中包括了60个非常详细的社会学问题，希望能把应答者（即使不是严格地任意抽样出来的）汇总到一整套数据中去。这些数据能用来做一种对一群人的详细的社会学分析，这种分析在一般的社会学工作中是从未做过的。由于在职业、教育程度和苏联计划制度下产生的工资方面都设定了标准，所以大家认为，小地区居民代表人数过多和大地区居民代表人数过少，这些情况对调查结果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在这本书中，表2—3所列的数据中包括的不同职业从业者的基本工资是以50827名应答者的综合数据为依据的。

从这样一个抽样调查中所得的关于政治态度的结论显然是更不可靠的，但是当把1993年仅取自各州和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两市的应答者的集合数据中得出的未经衡量的数据用于文章的初稿时，其结果被证明与后来经衡量的全国抽样调查的数据明显相似。逐日进行的民意调查也捕捉到了日里诺夫斯基的支持率上

升的情况，这是其他民意调查机构未予注意的。

1995、1996和1997年的调查均由在莫斯科的图曼诺夫与古勃格罗教授领导，参与1993年调查的地区学者，除少数外，也都主管地区的调查小组。在调查中也运用了基本的调查方法，对1993年调查过的同一地区进行了重访。虽然没有作什么努力去接触1993年的应答者，但是所使用的方法和调查人员的相同，应使一次一次调查所得的数据具有相当大的可比性。

1995年调查是从1995年11月30日至12月10日在杜马选举之前进行的。主要调查者是参与1993年调查的霍夫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政治学助教伊夫林·戴维海泽。抽样对象中包括3860名应答者，这次调查也是按州和共和国分类的全国性的任意抽样调查。问卷大致包括150个问题，其中大部分取自1993年的问卷，以保证其可比性。经费是由国家科学基金第SBR-96-00413号资助款和美国新闻署提供的。

1996年调查研究是由一个小组进行的。选举前的调查是在1996年总统选举第一轮选举之前两个星期进行的。全国性的任意抽样包括3781名应答者，挑选方法如前。这次选举举行了两轮，因为没有有一个候选人在第一次投票中取得多数票。在第一轮和第二轮选举之间对应答者进行了重访，他们此时对第一轮选举会有更新鲜的记忆，而此时去休假的人比第二轮选举后也会更少些；找到了3260名应答者，他们同意回答第二张问卷。选举之前的调查经费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提供的，选举后的调查经费则是由国家科学基金第SBR-96-01315号资助款和美国新闻署提供的。

1997年的青年调查是在1997年春进行的，它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在各州（不是共和国）进行的对3839名应答者的全国抽样调查。主要调查者是霍夫和雷曼。调查由进行选举调查的同一个小组进行，包括选举调查中提出的许多同样的问题。它也

包括有关婚姻、生孩子、生活选择、闲暇价值等几大块问题。它是由麦克阿瑟基金会资助的。

青年调查包括1068名17—18岁的应答者，1390名24—25岁的应答者，1381名31岁和32岁的应答者。调查的目的是要从那些刚在改革之前，在苏联解体时和在调查时成为成人的人中分出一个人数较多的次小组来。抽样是按选举调查的同样方法挑选的，只有一个例外。为了保证从我们希望得到的年龄群中选取较好的抽样，我们从住地名单中挑选了应答者，因为这些名单不但列了所有居民，而且也标明了他们的出生年月。因此把这一抽样同其他只限于特殊的年龄群的抽样作比较是极其有用的。本书中使用的1997年数据取自全国性的调查。

此外，同时还在前15个自治共和国的首府中对13600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抽样对象包括一半俄罗斯族居民，一半土著族居民。调查是在中学中进行的，选择的班级中既有不同民族的班级，也有同一民族的班级。这次调查的重点更多地放在民族问题上。它是由美国苏联和东欧研究全国理事会资助的。

注释：

例如可参见M·古勃格罗的3卷集《俄罗斯发展中的选民》，莫斯科，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所，1996年。此书研究了1993年和1995年在各共和国中举行的选举。另一个例子是S·V·图曼诺夫等的《年轻的俄罗斯人的文化世界：三种生活情况》，莫斯科大学出版社，2000年。

关于对这次选举中其他投票机构的舞弊情况的详细讨论，可见V·什利亚平托赫：《回顾：1993年的俄罗斯选举站》，载于《公共意见季刊》，1994年冬季，第579—602页。

最理想的是在每个州都进行类似的调查，但是凭我们所有的钱，我们不能给每一个应答者付足够的钱，从而说服所有地区

的社会学家参加这次调查。

例如对能做什么这一点，可参见苏珊·雷曼的关于出生地和迁移到城市时的年龄对转向市场经济的影响，其依据是约2万名应答者的回答，载于霍夫等编的《1996年俄罗斯的总统选举》，布鲁金斯，1996年，第6页。

霍夫：《1993年的俄罗斯选举：公众对经济改革和民主化的态度》，载于《后苏联事务》1994年第1期，第1—37页。

要更充分地了解这项研究采用的方法，可阅图曼诺夫的《年轻的俄罗斯人的文化世界》，第8—13页。

要了解这次调查和其他调查所得的材料，可见霍夫的《俄罗斯的政治地图：共和国和州》，载于《后苏联地理和经济》，1998年第2期，第63—95页；苏珊·雷曼：《从宗教复兴看俄罗斯各共和国的族际冲突》，载于《后苏联地理和经济》，1998年第8期，第461—493页。

目 录

前言	(1)
序言	(1)
第一章 导论	(1)
西方经济界人士的影响	(6)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计划的假设	(10)
国家和围绕投资的分析	(16)
第二章 经济改革和政府的作用	(24)
叶利钦的改革纲领和失业的矛盾	(27)
预算外补贴的发展	(33)
控制机制	(37)
结论	(62)
第三章 私有化	(72)
戈尔巴乔夫任期内的私有化	(74)
关于私有化性质的辩论	(80)
私有化过程	(86)
小私有化	(88)
大私有化	(91)
资产的分配	(94)
所有制模式	(103)
私有化的真正性质	(106)

第四章 储蓄和投资	(120)
俄罗斯改革家们对投资的设想	(123)
犯罪与腐败的逻辑	(128)
黑道与投资	(129)
政府的腐败与投资	(131)
在不同经济环境中个别的刺激措施和投资	(135)
农业和农村工业	(136)
小企业	(140)
大企业	(143)
出口资源的企业和批发性的出口贸易公司	(147)
预算外的补贴是掠夺性的税收	(151)
西方及预算外的补贴制度	(152)
第五章 有关经济政策的辩论： 1991—1993年	(159)
俄罗斯的独立和经济改革	(161)
叶利钦和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关系	(169)
叶利钦与企业家之间摇摇摆摆的关系	(173)
神秘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	(180)
1993年4月公民投票的经济政策	(184)
洛博夫与费奥多罗夫的冲突	(186)
解散人民代表大会	(191)
叶利钦在经济辩论中的打算	(194)
第六章 政治体制的反应： 1993—1996年	(207)
1993年宪法及选举法	(210)
公众舆论与1993年的杜马选举	(213)
1995年的杜马选举	(219)
不组织有意义的政党的原因	(225)
叶利钦及总统选举	(232)
选举中存在欺骗的可能性	(235)

叶利钦占有了政治上的中派地位.....	(239)
恐吓.....	(248)
理性的选民模式.....	(251)
第七章 庞氏骗局的垮台.....	(262)
逐渐发展的金融危机和1995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贷款.....	(264)
以股换贷计划.....	(268)
虚构的“金融寡头”.....	(271)
引进外国人.....	(274)
崩溃的开始.....	(281)
政治上的反应.....	(284)
最后的崩溃.....	(288)
崩溃的后果.....	(290)
第八章 制度、市场改革和民主.....	(303)
从发展角度审视俄罗斯.....	(307)
由此及彼.....	(315)
拥抱俄罗斯资本家和信奉科斯定理.....	(316)
渐进改革可以解决信息问题.....	(320)
容忍难以容忍的事情.....	(325)

第一章 导 论

1991年10月28日，鲍里斯·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5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宣告了他要“坚决地、断然地、毫不犹豫地”进行激进经济改革的意图。他说，这一改革的特征就是经济稳定化、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他警告说，在6个月中局面将十分困难。一个星期以后，叶利钦总统自己兼任了总理，并任命了一个激进的年轻经济学家班子来实施改革。36岁的叶戈尔·盖达尔就是这个班子的头头。

叶利钦在他10月28日的发言中宣布：“我们正式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欧洲开发合作银行参加制定进行合作和参加经济改革的详细计划。”他号召“在分析和拟订关键的经济、生态和地区问题上的建议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叶利钦的年轻经济学家们接着宣布，他们完全忠诚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揽子经济改革，认为这是“已被证明了的对理论和实践的回答”。1992年1月，他们允诺全部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

然而，从1992年初往后，俄罗斯现实的经济改革明显地离开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允诺要进行的那种改革。尽管有了这些背离，但西方对俄罗斯一揽子经济改